

修志资料选辑之三

修志初探



修志资料选辑之三

修志初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

修志资料选辑之三

修 志 初 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75 插页1 字数56 000 印数1—37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142-6/Z·9

统一书号: 17103·19 定 价: 0.70 元

出 版 说 明

《修志初探》是浙江省第二期地方志研究班的成果。研究班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浙江省地方志学会联合举办，参加学习的有来自全省各地的二百多位地方志工作者。我们从二百多篇论文中选出二十三篇，编成这本小册子，供修志同行参考。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八月

目 录

谈方志篇目的整体性·····	韩星波 (1)
修志必须注重应用价值·····	金经天 (6)
浅谈大事记的编写·····	王晓莉 (10)
关于交通志设“交通管理”篇的拙见·····	范军飞 (14)
地方志应突出地方特色·····	包江雁 (17)
对反映地方特色的浅见·····	王启超 (22)
试谈教育志的特色·····	金弈政 (26)
我对编写地方金融志的一些看法·····	董秉权 (30)
“河流”编写刍议·····	李陈访 (35)
专业志编纂浅议·····	徐赤金 (38)
公安志避免内容交叉重复的浅探·····	沈凤英 (41)
浅议市、县林业志的关系·····	胡浦生、曹景祥、江胜德 (45)
“水旱灾害”编写札记·····	杨盛渠、陈 休 (48)
粮食经济在新方志中的地位·····	黄 峰 (52)
编写《诸暨县供销社志》体现“三特色” 的构思·····	何朱章 (56)
《杭州市志·军事编》的编纂设想·····	田国明 (59)
工业志应给乡镇工业以足够的地位·····	黄再荣 (63)
从修志材料的取舍谈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应义平 (67)
浅议方志资料的征集·····	周品华 (69)
略谈口碑资料·····	葛荫铭 (72)

浅谈编纂方志中的资料搜集·····	边迪夫 (75)
新修镇志略议·····	俞尚曦 (78)
《普陀山志》古今内容详略问题的探讨·····	张惠飞 (82)

谈方志篇目的整体性

慈溪县志办公室 韩星波

地方志是采用一定的体例形式，记述一定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因此，制订方志篇目就要在整体性原则的指导下，考虑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等因素，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繁简适宜，去取得当，既包罗万象，又备而不泛；既突出重点，又简而不遗。

志书的整体性起着宏观控制的作用，它直接指导微观，即全志各大类及其各分志篇目的布局是受志书整体性的制约的。

志书的整体性，首先体现在篇目的排列上，这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基础。新县志篇目一般由综合（包括序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政区、人口、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五大类组成，但不标类别名称。以此顺序排列，基本上符合各类事物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即在一个地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展现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和社会面貌的变化。各大类的各个编、章、节、目，也要按照科学分类的原则，尽量保持编与编，章与章，节与节，目与目

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之互为一体。

为什么要把综合类排列在首位呢？这是因为大事记、政区、自然地理基本上是属于固定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人口则是渐变的社会现象。要想了解全县的概况，首先就要了解这个县的地理位置、自然面貌、人口状况。为什么要把政治类排列在第二位呢？因为志书中任何事类的竖写，构成了纵向的历史长河，而历史长河的流向、规律、归宿等一系列运动的结果，所得出的历史结论便是历史著述的主题。这届修志的断限一般是从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至1985年，但也有从辛亥革命（1911年）开始至1985年的，这140余年或70余年的历史演变，尽管包含有几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时期，但它最终说明了这样一个主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修志就要按照这个客观历史实际，通过资料的排列和记述，充分体现党的领导，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建国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文化的发展同党的领导正确与否是密切相关的。为了在新县志篇目中突出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章下设《县委的主要工作》条目，记述建国以来县委的主要活动，反映出党的领导作用。凡决策是正确的，一般来说，在其他编、章中反映的主要是成果；反之，就是曲折或失误。

其次，要在批判地继承旧志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新方志具有科学性和现代性，这也是志书整体性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次修志要把改革的成果载入志书，以彰明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例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厂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横向经济联系，发展乡镇工业和个体、联户工业，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社会主义精

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列入志书篇目，以体现时代特点。为了保持志书的整体性，还要力求使时代特点同地方特色相结合。时代特点在全国范围是相同的。但是把全国共同性的东西同本地区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就显示了地方特色。以慈溪县为例，具有特色的东西不少，其中之一是闻名全国全省的棉花高产县，早在1957年第一批（两个县）成为全国皮棉亩产上“纲要”的县份之一。

从目前接触到的一些志书篇目和修志情况看，还存在某些影响志书整体性的问题，主要是：

（一）分散立目，归类不当，影响事物的完整性。如有的县志把人口放在《建置编》，计划生育放在《文化编》，这样就不能体现同一事物的完整性。同时，把人口列在《建置编》也不贴切。因为建置主要是记述行政区域的现状和历史变迁，人口与建置是不同性质的两个事物，把人口纳入《建置编》显然是归类不当。计划生育，从卫生中分解出来的，虽然工作领导关系属文化大类，但实质是解决控制人口增长问题，立在《文化编》也属归类不妥。有一部县志在《地理编》下设序言、凡例、大事记、概述、县境、行政区划，这样归类也不恰当。因为序言、凡例、概述是属于总括全志的纲领性叙述，《地理编》是难以承担这一任务的。大事记、行政区划与地理也是不同性质的事物。另外，《经济体制编》下设土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手工业工业体制、商业体制，这种农工商体制的大归并，势必造成各业生产、经营的机械分离。

（二）误把个性当作共性。有些志书篇目把政法工作条目列为司法，似乎司法可以包括公安、法院、检察、司法等部门工作。从狭义说，司法只包括法院、司法局工作，从广

义说，也可包括检察院，但不能包括公安局。

（三）以部门代替专业，影响专业的全貌。有些成稿的志书，记述信访只记县委、县府信访办公室的信访史实，而不包括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法院等单位的信访，这只反映信访工作的局部，而没有反映整体。如果志书不反映信访工作的整体，就不能完全反映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重视信访工作的时代特点。

（四）记述过于简略，不能反映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部县志记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只记机构沿革、负责人调动，而没有记述各个时期纪检工作的任务。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纪律检查工作由过去单纯办案转到抓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与办案相结合。这些主要工作和重大转折过程不记述，就不能反映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五）概念不清。修志要详今略古，按下限时间的行政区域记述历史和现状。在修志中，有些部门从篇目到收集资料，离开了“不越境而书”的原则，对区域变更前按原区域收集资料和记述，区域变更后按现区域收集资料和记述，这样势必造成纵要断线，横要复项，两地或三地的同类事物分头记述，结果修出的新志不是“一方之全史”，而是两方或三方的断代史。

以上存在的问题，都影响着各个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当然也将影响志书的整体性。

为了确保新修志书的质量，保持志书的整体性，有必要加强修志理论研究和修志业务指导。主要应做到这样几点：

（一）修志工作者要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结合工作实践，加强修志理论研究；在吸收旧志精华的同时，探索创新的途径，特别要对志书篇目的整体性进行研究，科学地加

以分类，保持事物间的有机联系。

(二)用经验交流和及时传递信息等方法提高修志人员的素质。

(三)有关修志的原则性规定，如“不越境而书”等，应使修志人员统一认识，明确做法，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确保志书质量。

修志必须注重应用价值

绍兴市志办公室 金经天

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发展和存在的。它的应用价值越高，生存力就越强，反之，就会消亡。方志也不例外。

地方志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当时的需要相关联，并且与方志日益显示其应用价值分不开的。目前方志界公认，我国的方志始于春秋战国前后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古地图多个“源头”。国别史是记载各诸侯国的历史与现状，由外史掌握，诵训官为天子讲述，“以诏观事”。地理书是人民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地理知识书，是为指导生产服务的。古地图是由周王朝的大司徒掌握，由土训官“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可见这三个“源头”是各有其用的。以后由多源而汇集一志，就是增大它的应用价值。晋朝常璩在《华阳国志序》里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说明当时志书的应用价值有所增大。方志经隋、唐而入宋代，内容由地理为主而变成人文为主，体例开始完备，志的应用价值迅速提高。宋朝马先祖在《景定建康志序》中说，方志的价值在于“忠孝节义，表人材也；书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

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总之“有补于世”。元、明时期，对方志的应用价值更加重视。元代杨敬德在《赤城元统志序》里说：“著星土，辨疆次，而体咎可征矣；奠山川，察形势，而扼塞可知矣；明版籍，任土贯，而取民有制矣；论人物，崇节义，以彰劝惩，而教化可明矣。”明代的康海在《朝邑志序》中强调志的应用价值。他说：“志者记也；记其风土文献之事，与官乎斯土者，可以备极其改革，省是其疾苦，累行其已行，察识其政治，使天下为士大夫者读之足以兴，郡邑者读之足以劝，非以夸灵胜之迹，崇奖饰之细也。”正因如此，元、明两代方志的体例更趋完备。到了清代，方志体例严谨，种类齐全，数量大增，应用价值更大。当时方志大师章学诚明确指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所以他修志很注重经世致用。当然，历代修志的应用价值都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考虑的。到了民国时期，不论是学者的论述，还是民国政府颁布的《修志条例概要》，都更强调方志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民国18年，傅振伦在草议的《八则志例》中，根据当时的形势，对修民国方志提出了新的要求，要“略古详今，侧重现代”；“博采详志，注重实用”；“特详悉于社会方面”；“偏重于物质方面”；“广辟类目，注重科学”。民国29年，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一书中又提出了方志创“四用”的主张。他说：“今修方志，不分史地，勿泥体裁，时代所需，须呈‘四用’。”这“四用”就是：一、科学资源；二、地方年鉴；三、教育材料；四、旅行指导。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对方志的要求。由于民国时期政治腐败，战乱频繁，方志成书不多，佳作更少，因而对社会没有

产生多大的实际效用。

纵观方志的发展史和学说史，我们知道历代都非常注重方志的时代应用价值。现在，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任务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迈开了步子。我们也应当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出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强调方志的应用价值，既有现实意义，也有长远意义。

在理论上强调新方志的应用价值，就能进一步认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重要性，有利于端正编志的指导思想。要知道，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不仅是为了继承“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向前发展。近代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和艰难曲折的历程，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通过志书，就能使人们了解实情，认清规律，趋利避害，改进工作，奋发前进。正如曾三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各地的修志工作，是对当地的历史和现状的一次巨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它必然会对当地的实际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大量的事实证明，新编地方志工作，不仅可以收到近期的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的社会效益。随着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它的作用将愈来愈明显。编修新方志，确实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和各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地联系的重要工作，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程。”充分认识这一点，修志工作就能更快更好地进行。

在实践上突出新方志的应用价值，就要十分注重志书的质量。因为方志的应用价值完全取决于方志本身的质量。提

高新方志质量涉及的方面很多，其重心应是增加志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根据曾三同志的报告，“首先表现在它所占有的资料的翔实、系统和准确上面”，“同时也表现在志书组织结构的科学合理和内容的深刻丰富上面。”通过提高质量，使社会主义新方志真正成为一部科学文献。它不仅是一个地方自然面貌的写真，历史发展的记实，而且是现代科学的结晶，实用知识的宝库，人民创业的指针，领导图治的明鉴。

浅谈大事记的编写

衢州市志办公室 王晓莉

地方志，有人称为“一方的百科全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内容广泛，无所不包。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因此它可以作为各级党政领导施政决策的依据，四化建设的参谋，进行思想教育的乡土教材。

地方志设大事记，由来已久。最早见于宋代嘉定年间高似孙著的《剡录》中的《县记年》。当时称为“纪年”、“总纪”、“年纪”之类。民国时期，地方志已普遍设置《大事记》或《大事年表》。现在新修的志书更是把大事记作为一志之经，也即历史的主线。它有补于方志偏于横剖，缺于纵贯的缺点，以时间为纵线将方志横排的内容有机地连接起来，贯穿全书，理顺了从古到今社会发展的大致脉络，成为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事记的编写，一般是按照时间顺序采用编年体为主，系统地记载一个地区的各个部门在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这些事件和活动，对当时或后代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反映了历史的发展。它所提供的各种信息，有借鉴作用。如重大政治事件、经济变革、特大自然灾害等等。

新方志的编纂不是旧方志的续修，大事记的上限也不应定在上次修志的下限。要用新的观点来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用新材料进一步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用新的方法选择历史上有关建置、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予以全面的记述。它的上限一般应该延伸到建置之始。有的《大事记》也可以推到建置之前，衢州旧志对大事的记载，最早的始于公元前482年的春秋末期。如“有姑蔑人参加战事”，这是衢州地区第一次见于记载的历史事件。而现在的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则可以从五六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写起。1974年衢县上方一带的多处石灰岩溶洞中，发现猕猴、大熊猫、中国犀、野水牛等动物化石。特别在距上方12公里的建德县李家公社新桥大队乌龟洞，于1963年发现了一颗人类的犬齿和哺乳动物化石，经鉴定是新江原始人类，定为“建德人”。由此可见，距今五六万年的远古时代，就有人在这一带劳动生息、繁殖，揭开了衢州古代历史的序幕。此外，在衢州市辖区内，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数十处，证明远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已在这里定居，从事农业、狩猎和手工业生产活动。这为研究衢州的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如果事件的时间跨度过大，而为了资料的完整性，也可以记载事件的始末。如记述1940年日本侵略者在衢州一带投下鼠疫菌这件事，可以先记载1940年10月4日上午敌机窜入衢州上空投下细菌，再记述17天后鼠疫蔓延，至12月发病256例，死亡254人，一直记到1946年，死亡千余人止。这样集中记载不仅能看出事态的发展，同时更能揭露事态的严重性，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认识，激发人民对日寇的仇恨。